

川西地下党与恶霸刘文彩

●丁 群

凡看过大型泥塑《收租院》的人，都会记得四川省有个大恶霸叫刘文彩的。刘文彩的克星，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装领导人之一的李维嘉，当年作为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在重庆的大逮捕、大屠杀中死里逃生，到川西参与领导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与刘文彩及其依靠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殊死的斗争，牺牲了许多战友，终于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岷峨大地，奏响了一曲“安步漫穿生死关”的人生凯歌。

在重庆的大逮捕中幸免于难 奉派参加川西的武装斗争

李维嘉1918年出生于重庆一个衰落资本家的家庭，读完高中一年级即失学。在抗日救国的大潮推动下，他于1937年冬参加地下救国会，1938年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先后任地下党重庆上城区委委员，乐山中心县委下属的五通桥区委书记、夹江县委书记、南充地区工委书记。内战大规模爆发的1946年夏，调重庆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分管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妇委和部分统战工作。

《挺进报》是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以后，惟一能向重庆和附近地区的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转达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刊载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秘密报纸，很受地下党员和党的同情者的欢迎。李维嘉曾有词礼赞：

“蓦然一点流萤，时闪烁，依稀照明。迢递晨曦，悄传花信，鼓角长鸣。”

《挺进报》的大量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不久，该报又奉上级党委的指示，开展对敌人的所谓“攻心战”，不时将《挺进报》投递给重庆国民党军政机关的高级官员，连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主任朱绍良，也收到了该报。朱绍良勃然大怒，命令军统特务头子、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会同重庆的中统特务、宪兵、警察彻底追查，限期破案。徐远举通过伪装进步的特

务分子李克昌、曾纪纲，骗取了中共地下党员陈柏林的信任，逐步顺藤摸瓜，抓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个别共产党员经不起敌人的刑讯逼供，叛变投敌，尤其是地下党川东临时工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的被捕叛变，致使重庆、川东、川西的地下党组织遭受惨重的破坏。在这个惊动全国、以后在《红岩》这部小说中得以再现的“挺进报案”中，先后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达133人，其中由“外省另案讯办”的8人，叛变事敌的12人，被杀害和失踪的88人，脱险幸存的仅25人。《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烈士，就是在“挺进报案”中被捕而英勇牺牲的。

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李维嘉接到川东临时工委秘书长肖泽宽的通知，要他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于4月17日去北碚开会，研究市委书记刘国定、委员许建业被捕后的形势和对策。肖泽宽强调，他们必须准时到会，否则就是出了事故。李维嘉准时赶到北碚约定的地点，与肖泽宽一起等了很久，不见冉益智的踪影。两人估计发生了事故，立即转移。肖泽宽要李维嘉第二天一早赶回重庆，探明情况。李维嘉为防不测，在临近重庆终点站时提前下车，拐弯抹角地走到临江门外华一村家门不远的拐角处，驻足观察动静，发现正在门外晾晒衣服的小保姆，在遥遥地向自己摇手，同时发现家里有人头晃动，知道事态严重，立即转身离去。当晚，李维嘉与自己的秘密交通员林友梅接上了头，才知道冉益智已经被捕叛变，并于当日早晨带领特务先去林友梅供职的大通商号、后去李维嘉居住的哥嫂家里，抓捕李维嘉。特务们没有抓到李维嘉，就把他的哥嫂抓走了。李还得知，自己分管的市妇委书记胡启芬已被敌人逮捕（后被杀害）。《挺进报》是否已遭毒手，情况不明。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李维嘉首先想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以后，不仅重庆乃至川东的党组织会遇到严重的破坏，还可能牵连到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领导西南地

区地下党组织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因为川东临时工委资助川康特委的一笔钱，就是刘国定指派李维嘉面交蒲华辅的；川东临时工委和川康特委这两个平行组织之间，也是由刘国定指派曾在川西工作多年的李维嘉充当联系人的。钱瑛在上海的通讯处，刘国定是知道的。李维嘉当即决定：立即绕道去成都，向蒲华辅报警，并请蒲转报钱瑛；同时采取投函通知的办法，要求《挺进报》的陈然和“小民革”的赵景森立即转移。他给《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署名用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夫妇幼子的名字“彭云”。遗憾的是，陈然接信后虽然知道这是党内同志提醒他赶快转移，但却坚持要印完那一期《挺进报》再走，结果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听取了李维嘉的报告后，立即向钱瑛发出警报，并要李维嘉交出自己在重庆所掌握的党员关系，派他去川西南武装工作委员会任副书记。从此，李维嘉便开始参与了川西地下武装与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斗争。

武装暴动遭受刘文彩的疯狂镇压

刘文彩是川西的大地主、大恶霸、大毒枭、大袍哥头子。他倚仗其胞弟、原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后兼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土财主，一跃而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又任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杀害了共产党员李筱文等多人；他还以“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咖啡，成为包销云

南鸦片的毒品大王。1932年，刘文辉与其堂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为争夺地盘兵戎相见，失败后退踞西康。刘文彩也携带着800多万银元和部分武装，由川南的叙府回到川西的故里——大邑县安仁镇。他一面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至川西解放时拥有土地1.2万多亩），修建起多座豪华的庄园；一面以当地原有的4个袍哥组织为基础，网罗川西、川南18个县市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裹挟了部分群众，组成一个号称拥有“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封建帮会组织——“公益协进社”，自任总社长，成为凌驾于地方行政长官之上的幕后首脑。在其势力范围内，一切政令法令，未经刘文彩首肯，休想推行。

大邑县是刘文彩的巢穴所在地。这里，背有高山，中有丘陵，下有平坝，大地主集中，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加以袍哥、烟帮武装甚多，具有开展武装斗争的某些有利条件。但是，这里的地主武装比较强大，又距省会成都不远，贸然进行武装起义，反动军队会很快赶来进行镇压。1947年春，大邑进步青年肖汝霖、周鼎文组成第一支武装工作队进山活动，很快就遭到刘文彩所豢养的川西大匪首郭保之部的袭击。这支50多人的武工队在牺牲了12名队员后，不得不分散转移。以后，中共川康特派刘丹（原名吕英）前来领导武装斗争。1948年春，又派来李维嘉和曾任八路军连长的老红军朱英汉，组成了以肖汝霖、刘丹为正副主任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以刘丹、李维嘉为正副书记的党支部，成立了包括邛崃李唯实所部的武装工作队。武工委不顾敌强我弱的形势，盲目执行上级的指示，决定用“抗丁、抗粮、抗捐税”的口号，于1948年7月中旬发动武装暴动。并定于7月12日在唐场肖汝霖家召开干部会议，具体部署攻打邛崃县傅安乡国民党十七师的武器库，将缴获的枪支弹药武装群众，再去攻打刘文彩的老巢安仁镇刘氏庄园的作战方案。这个含有盲动成分的方案还未下达，就被内奸告密，武工队又一次遭受刘文彩部的突然袭击。

7月12日拂晓，刘文彩的看家武装大邑县自卫总队第三中队，伙同安仁乡团队共200余人，将肖汝霖的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武工委委员、直属一队队长李唯实和副队长朱英汉，率队从后门突围，被敌人阻击退回。驻扎在陈林盘的直属二队，在刘丹、陈仕英指挥下猛攻敌军的侧背。一队改从大门突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武工队员刘家茂在渡河时不幸溺死。一队转移至邛崃县境时，又遭到国民党十七师武器库守军的阻击，负责断后的朱英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肖汝霖、李安澜越墙进入邻居家中隐蔽，得以安全脱险。李维嘉这次因住宿在敌人的包围圈外，没有遭遇这场劫难。



▲笔者（左）与重庆市委原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李维嘉合影

找到新的出路,又遭新的挫折

七一二事件以后,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的干部们,转移、隐蔽到新津县顺江乡吴店子村党外朋友李修修家的大院里,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新的斗争方式。

对于这次起义的失败,大家都认定可能是内部有人向敌人告密,但一时还弄不清真相(到次年才查明系李佩文等3人叛变告密,并予以处决)。对于今后的斗争,会上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不能在大邑搞武装斗争了,应该撤出;一种认为大邑还有搞武装活动的余地。到成都向川康特委请示的刘丹,回来传达了特委的指示:改武装暴动为组织小型武工队进行武装袭击,打了就跑。刘丹传达后,大家沉默不语,只好休会。

当晚,干部们在地铺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李维嘉就近与人交谈,发现交谈者都认为搞小股武装袭击没有把握。次日开会继续讨论特委的指示,李维嘉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多数同志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在大邑搞武装袭击过早暴露自己,易遭敌重兵镇压,不如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办法,一面以半合法的烟帮武装、袍哥武装的形式出现,搞“两面武装”;一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逐步扩大地下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待机而动。李维嘉据此起草了文件,由刘丹带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并获批准。武工委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肖汝霖、周鼎文率领将武工队骨干力量以袍哥武装形式,带到川康交界的象鼻子山进行整训,多数未脱产的农民武装仍寓兵于农;另一路由李维嘉、李安澜率领部分党员骨干,转到刘文彩占地近千亩的三岔乡一带,以学校为据点,进行群众工作和扩建党组织的工作。刘丹统管全局并负责山区、坝区之间的联系。

这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又遇到新的考验。

西康省芦山县的象鼻子山,与四川省的邛崃、大邑两县交界,几面悬崖陡壁,只有一条石骨路通向山顶。山上只住有三家农民。武工队上山集训不久,就得知敌人在调集军队,准备从四面包围象鼻子山。是留下来与敌人周旋,还是及早跳出包围圈?跳出去又该走那条路线、找什么人接应?面对这样难题,武委会主任肖汝霖自告奋勇,带领川大学生徐达仁下山探明情况,沟通关系。不幸的是,他们潜行到大邑县王泗乡折向凤凰乡时,即在龙门坎与刘文彩豢养的大匪首郭保之部狭路相逢,当即被捕,被押送到安仁镇的“公益协进社”总部。肖汝霖沿途高呼:“我是唐场肖汝霖,不是坏人啊!”以此向党报警。刘文彩亲自对肖进行刑讯,并以押交县政府为名,下

令将肖汝霖、徐达仁杀害于押送中途的王店村。当年与肖汝霖一起战斗过的武工队员李志恩告诉笔者:肖汝霖为购买枪支弹药组织地下武装,曾多次变卖家产,牺牲时年仅28岁。

肖汝霖、徐达仁牺牲的噩耗刚刚传来,在象鼻子上山整训待命的武工队,又遭遇了一次凶险。这天,从右边的悬崖陡坡上爬上来12个肩背长枪、手提短枪的汉子,声称他们是烟帮武装,听说这里人多势众,想前来合伙。武工队中有人认出其头目,是土匪郭保之部下的一个小头目,人称杨麻子,又叫“旋得极”(吸人血的蚂蝗)。武工队负责人周鼎文,深知郭保之惯用打入内部、吃掉对手的奸狡手段,知道来者不善。他当即派涂赞朝出面,以礼相待,将这批匪徒接到堂屋和隔壁卧室里休息。这些匪徒东张西望,手指不离短枪的机头。问其来历,前言不搭后语,特别避讳与郭保之的关系。周鼎文当即决定:先发制人,立即消灭这股居心险恶的匪徒。随即请杨麻子进卧室抽大烟,请在堂屋里的杨匪爪牙吃烧玉米。这时,背靠背面向卧室的周鼎文和面向堂屋的陈孟君,按事先约定的信号,手臂一碰,齐声大喝:“不许动!”两人连发数弹,武工队员们也同时开枪,12个匪徒未及还手,全被击毙。涂赞朝也误中流弹牺牲。

消灭了杨麻子这股匪徒的次日,在山下进行群众工作的刘丹,给武工队带来了山下工作大有进展的消息。武工队人心振奋。当即决定,由周鼎文率队从夹缝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袍哥武装的面貌,返回大邑平坝地区,分组隐蔽,掩护群众工作的开展。

正当川西南武工委领导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建党工作顺利进展之际,一次意外的打击又突然袭来。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卖,滞留在成都的川康特委书记蒲华铺,于1949年1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蒲被捕后也叛变了,出卖了川西南武工委党的主要领导人刘丹。刘丹在成都已知特委出了问题,却未及时转移,即被敌特逮捕(后牺牲于重庆渣滓洞)。同年1月21日,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又寻踪扑向李维嘉隐身的大邑县三岔乡小学。在此以前,李维嘉因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在乐山被敌特



▲刘文彩

逮捕(后牺牲),已奉命转移到距三岔乡不远的崇庆县安顺乡。按照原先的约定,刘丹应于1月20晚由成都返回大邑县三岔乡小学与李维嘉接头。李维嘉如约于当晚潜返三岔乡小学,等到深夜,仍不见刘丹归来。经历过重庆大逮捕的李维嘉感到情况有异,次日早饭后立即转移。李维嘉走后不久,敌特即至。他们没有抓到李维嘉,就将三岔乡小学校长田载重(后入党)和教导主任王俊华(女党员)抓到县里去追问(后由地下党通过进步人士王安懋将二人保释)。李维嘉又逃过了一劫。

川康特委遭受敌特的大破坏以后,仅存副书记马识途一人。马识途奉召赴香港向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汇报情况,行前指示:李维嘉撤离大邑,隐蔽待命;川西南工委的3名重要领导成员李安澜、周鼎文、李唯实和雅乐工委幸存的惟一委员邹玉琳,按照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既定方案,分别领导川西南几片地区的工作。

顺应形势,深入发动群众积聚力量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占领敌巢南京。蒋介石集团收拾残兵败将,准备固守南方尤其西南各省,并加紧在其控制区搜捕共产党员;但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已是不可逆转的了。在此形势之下,川西南工委所属的党组织,也各尽所能,在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当地一些党团干部和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以四川大学学生为主的大批进步青年,以当长工、打月工等形式,扎根于群众之中,与农民谈心交朋友,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法大纲》,从结拜干亲、搞姐妹会,进而组织秘密的农民同心会、农民协会、农民先锋队,并且在农民积

极分子中发展“民协”、“火星”、“新民主主义实践社”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组建秘密的农民武装。到1949年6月,在大邑、邛崃、仁寿、灌县等地,通过各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已上万人,农民武装已拥有上千人枪,并在部分乡村建立起党支部和党小组。大邑县的十多个乡,已在地下党的实际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地下党还与大邑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地下民主同盟大邑县负责人王安懋,建立起密切的统战关系,由大邑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李安澜派出党员担任王的秘书和勤杂工(实为交通员)。在王安懋的帮助下,地下党的武工队取得了大邑县自卫总队下属的3个武装巡回检查组和肃奸队的番号,可以打起“除匪缉毒”的合法旗号,执行党的武装任务。王安懋所属的3个自卫中队,除第三中队仍由刘文彩直接控制以外,其余的两个自卫中队,还可对地下党的武装活动给予掩护。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和袍哥组织,也纷纷向进步力量靠拢。在仁寿县,邹玉琳领导的地下武装,也控制了该县的警察中队。在灌县,李唯实在矿区组织了猎枪会。在双流县,周鼎文在建立擦耳岩据点和交通站的同时,还组织党员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印成《火炬报》秘密发行。在崇庆县,由陈万堂办起了有30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

面临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南进军的形势,川西南几片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深感继续各自为战,已不适应工作的需要,要求恢复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并一致推举李维嘉出来承担主要领导责任。1949年6月,李维嘉和邹玉琳、李安澜、周鼎文、李唯实等,在成都西门外民主进步人士朱召南家里秘密开会,决定在川西南工委和已经遭到破坏的雅庆工委的基础上,组织统一领导川西边地区地下斗争的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维嘉任书记,邹玉琳任副书记;同时,决定利用国民党政府被迫颁布的《二五减租条例》,发动农民群众,把国民党搞的假减租,变成真减租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壮大人民力量。一俟解放军挺进川西,即公开打出游击队的旗帜,配合解放军牵制和阻击敌军。这一领导机构后来得到中共川康特委马识途的承认。

在变假减租为真减租的群众运动中, 刘文彩无力回天病重气急身亡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聚力量,在大邑县的三岔、元兴等乡,有上万农民参加的矛头直指以刘文彩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减租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取得减租运动的胜利,李维嘉于同年夏重返大邑,掌握斗争的全局,具体工作由李安澜组织实施。他们



川康边游击队向解放军报告敌情

决定分片召开党的会议，要求在减租斗争中，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进行合法斗争，同时做好以农民武装对付地主武装的准备；对于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和恶霸地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这年九、十月间，正是秋收登场、地主收租的季节。减租运动很快由外围指向占有土地最多的刘氏家族。当刘文彩的侄子、外号“八老虎”的刘元珽，派其管家杨信孚，带着20多辆鸡公车，到静林寺收租时，农民便很快围了上来。积极分子陈银洲、陈字贤挤到杨信孚面前便问：“杨先生，政府宣布实行二五减租，刘家执行不执行”杨信

孚白了他们一眼说：“减啥？没有见过告示，八老师也没有打过招呼！”大家正在与杨信孚讲理，外面有农民放了一枪。杨信孚带来的家丁也亮出枪来，威吓农民说：“烂炮火算个球！”农民陈启安提起锄头逼近那个家丁，骂道：“你杂种敢动枪？”周围群众愤怒呐喊：“不减租就砸风谷机！”“不减就拉开（开枪）！”杨信孚见农民人多势众，只好连声答应：“照减，照减。”

为对付农民抗租，刘文彩的侄子刘世荣带了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家丁，到元兴乡党林村放了警戒，强迫收租。当地农民一面应付拖延，一面向武工队报信。地下武装干部王旭明等赶到党林村时，竟遭刘世荣的警卫开枪射击。后见农民武装越聚越多，刘世荣只好藏进廖海丰家的牛槽里，十多个武装齐全的家丁都被农民缴了械。刘世荣吓得魂不附体，跪地求饶，答应照章减租。

刘家地主见小股武装已经弹压不了武装的农民，就派出几百名看家部队，开到元兴、三岔两乡实行武装收租。但他们才过了斜江，就被农民武装堵往，并被多出几倍的农民武装围困起来。他们见势不妙，只好派出当过国民党正规军团长的刘从周，陪同安仁乡副乡长王丕昭出面谈判。地下武装代表陈仕英、陈威仪严正指出：“你们是武装反抗政府二五减租，是非法的反动行为！”王丕昭连声陪礼说：“误会，误会！”在农民武装的优势面前，他们不得不接受农民的条件：租谷照减百分之二十五，保证不因减租夺佃。

消息传到在成都治病的大恶霸刘文彩那里，他气



▲当年川康边游击纵队的主要领导人，前左三：周鼎文、左五：李维嘉、左六：邹玉琳、左七：李安澜、左八：李唯实。

得口吐鲜血，连声叫嚷立即回安仁，死也要死在安仁。家人们将他抬进小轿车，没有回到安仁就死在途中。时为1949年10月17日。

敌军反扑未逞，终于难逃覆亡

刘文彩死后，国民党省主席王陵基，在大邑县参议会的恳求下，于当年10月派出3个省保安团的兵力，到大邑地区“清剿”农民武装。县长徐元勋先派王安懋率大邑县自卫总队下乡“扫荡”。王安懋将敌情通报给地下武装后，即装模作样地带队下乡走了一趟回城交差。地下武装紧急疏散了暴露人员，除党员肖国珂、田载重未能及时转移，被捕后英勇就义外，未受损失。保安团“围剿”扑空，即由大邑县县长徐元勋命令大邑县自卫总队在公园集合，强行缴械，并逮捕了自卫总队副队长王安懋。队员中有人奋起反抗，当场击毙了反动县长徐元勋。万人减租运动和反动县长被击毙的消息，使成都为之震动。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四川。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决定：将川西南武工队在各县的地下武装和仁寿县的农民地下武装，以及西康大渡河的一支地下武装，统一组建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以肖国珂烈士之父肖绍成为司令员，李维嘉任政治委员，周鼎文、李安澜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公开发表宣言，打出旗号，拉出队伍。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2军分兵向川西挺进。国民党军队纷纷向西南边

境逃窜。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4000多名武装,配合解放军在大邑、邛崃、新津、仁寿等县出击,并包围了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约3000人,逼迫他们举起了白旗。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备受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反动势力镇压、迫害之苦的川西南地下武装和川西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只是刘文彩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恶霸,因在解放前两个月因病重气急身亡,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办。

不许为刘文彩翻案

川西解放后,李维嘉曾任川西农民协会副主席,川西行署委员和川西土改委副主任,参与领导了大邑等地的土地改革。以后,长期任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省农办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他即因解放前几次在劫难中许多战友被捕而他没有被捕,受到某些人的怀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还以“他到哪里哪里就出事”为由,诬陷他是“叛徒”、“特务”,受尽了羞辱和折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才给他作了“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此后,他即被选为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离休以后,他本可以在闲适中安度晚年,想不到近七八年来,有些人竟千方百计,为罪恶累累的大恶霸刘文彩涂脂抹粉,声称刘文彩是“典型的乱世奇才”、“慷慨捐资兴学的开明地主”、“仗义疏财的大善人”。李维嘉和许多老战士为对历史负责,不得不奋起挥笔反击。

早在1994年初,大邑县的某些企业,在一些惟利是图的人策划下,就公然推出了“刘文彩系列产品”,从

▼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正门



▲刘文彩地主庄园内的一个卧室

“刘文彩家酒”,到刘文彩小老婆爱吃的“唐场豆腐乳”,四处招徕顾客,并鼓吹“刘文彩家酒即将进京”;一些店铺、路牌也争相以“文彩”、“庄园”命名,美其名曰“庄园文化”。李维嘉等老战士得悉后,异常气愤,当即由一位同志撰写了《莫使历史颠倒》的文章,在报上进行批评,并向中共大邑县委提出了意见。大邑县委制止了这些行为。

时隔不久的1995年3月,适逢原来以刘文彩命名的原文彩中学、现大邑安仁中学建校50周年,有些人又以发展大邑经济、提高大邑的知名度为借口,修葺了当年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纪念碑,展出了颂扬刘文彩的校歌,并且要求恢复文彩中学的原名。李维嘉又与李安澜、周鼎文等人,联名致信中共四川省委,并由一位同志在《杂文报》上发表了《要恢复什么》的文章,质问要恢复文彩中学的旧校名是纪念刘文彩的什么,是剥削老百姓?屠杀共产党人?

这场风波刚刚过去,有些人又借“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易名为“刘氏庄园博物馆”的机会,并抓住原陈列中的个别失实之处,大作翻案文章,欢呼“地主庄园已经摘帽了”。还有人在报上公开发表意见,要求对刘文彩恶霸地主的定性加以修改。李维嘉等人又针锋相对,指出“庄园更名,也改变不了刘文彩的罪恶历史,也不是对过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全面否定”。

1998年底,又有人在广州一家报纸发表《刘文彩暮年办学及其是是非非》的长文,宣扬刘文彩捐资创办文彩中学的善举;一家省级

报纸于1999年4月8日,用整版篇幅予以转载。李维嘉等当年与刘文彩浴血战斗的战友,又与土改时期任大邑县委书记的宫韞书,联名致信四川省委,对该报为刘文彩涂脂抹粉的行为表示抗议,迫使其作出检讨。

然而,这篇长文的作者又于1999年11月公开出版了一本长达25万字的专著《刘文彩真相》,说刘文彩既有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的斑斑污点,又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种种光环,并非“传说中的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而在说及其斑斑污点时,又以其胞弟刘文辉作挡箭牌,来推卸其罪责。对于刘文彩疯狂镇压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屠杀共产党员等罪行,则一字不提。而对于原地主庄园陈列馆中个别浮夸失实、在三中全会后已获纠正之处,则极尽讥讽、挖苦。更有甚者,这本书竟给刘文彩套上与刘文辉“两位一体”,共同反蒋拥共的光环。此书一经出版,大邑、成都、重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十多家报纸,竟以奇货可居,竞相报道宣传或摘要转载。一时间,大恶霸刘文彩竟成了不可多得的开明地主、福泽四方的善人。李维嘉等老战士怒不可遏,撰写了一批批评的文章,但除个别刊物刊载了李维嘉写的一篇文章,竟找不到发表的阵地,有关单位态度也比较暧昧。老同志们气愤至极,决定由已离休的3名原地下党干群和3名南下干部——原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原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副政委李安澜,原省政协副主席周颐,原省顾委常委宋文彬,原成都市委副书记宫韞书,于2000年5月18日,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这部为刘文彩翻案的书,是当前有些人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出表现”,要求对出版单位和宣扬这本书的新闻出版部门,进行批评和查处。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曹庆泽接信迅即呈书记尉健行,尉于当年6月12日批示:“同意请四川省委严肃查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发布了对该书予以收缴、封存、销毁并不得再出版发行的决定。

笔者参观了刘氏庄园,证实刘文彩确是十恶不赦的恶霸

根据李维嘉的建议,笔者专程到距成都以西60公里的刘文彩庄园,如今悬挂着“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门牌的那座豪宅,进行参观访问;并由当地的几位老武工队员带领,察看了当年地下武装与刘文彩匪帮鏖战的旧址,以及当年被刘文彩杀害的原川西省武委会主任肖汝霖的故居。



▲泥塑《收租院》(部分)

令笔者惊异不止的首先是:这个占地38亩、拥有160多间房屋,虽经历史风尘,仍然显得富丽堂皇的大宅院,只是刘文彩当年所拥有的多座公馆中的一座。

跨进雕刻繁琐的巍峨正门,不远的大花坛两边,就是东西对称的中式和西式客厅,里面陈列了许多精美的珍宝古玩和多幅刘氏家族成员的照片。沿一条灰道西行,便进入所谓“风姿绰约小姐楼”的大院落。折向北行,进入另一个院落便是刘文彩玩弄妇女的“逍遥宫”,以及供他按不同季节吸食鸦片的“夏宫”和“冬宫”。走进供养着5名妻妾的四合院,每个房间都装饰得非常豪华。其中刘文彩常住的卧室内有一张六根柱子上都盘有金龙的大花床。这个四合院过去,就是佛堂、客房以及堆放租谷的粮仓。据说,这座名为“红仓”的粮仓,只是刘文彩所拥有的27座粮仓中的一座。走到较偏僻处那座半地下室,讲解员说:“这里是刘文彩存放鸦片的地方。”走到房屋极其简陋的雇工院,这里的介绍文字说:刘文彩全家常住在这里的只有六七个人,而使用的雇工、杂役则多达60余人。走到陈列着大型泥塑《收租院》的那个院落里,讲解员介绍说:刘文彩的这座庄园,是霸占了27户农民的土地建成的。农民刘益山的屋基与刘文彩的庄园相邻,刘文彩为霸占他家的屋基,指使安仁乡乡长刘绍武以通匪的罪名,将刘益山关进乡公所,强迫他将屋基出卖给刘文彩。农民杨建民、杨义和、杨大发,因为拒绝出让屋基,先后被刘文彩杀害了。

看了这座用农民的鲜血凝结而成的刘氏庄园,再到肖汝霖等烈士被捕被杀的现场,听了老武工队员讲述当年刘文彩与人民为敌的故事,笔者不能不对某些人肆意美化刘文彩的种种倒行逆施,表示愤慨。

责任编辑 谢凤英